

文本变形倾向关联模式论辩

梅阳春 汤金霞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06;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泰州 225300)

提 要: 贝尔曼构建的文本变形倾向一共有 12 种, 分别是合理化、明晰化、扩充、雅化和俗化、质量受损、数量缺失、节奏破坏、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语言模式的破坏、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以及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这 12 种倾向以特定的模式相互关联, 而明晰相关模式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单向因果模式、双向因果模式以及多向因果模式 3 个维度对文本变形倾向的具体关联模式进行论辩。

关键词: 文本变形倾向; 关联模式; 单向因果; 双向因果; 多向因果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3-0103-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3.017

On the Interconnecting Models of Textual Deforming Tendencies

Mei Yang-chun Tang Jin-xia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izhou College, Taizhou 225300, China)

The twelve deforming tendencies formulated by Antoine Berman consist of rationalization, clarification, expansion, ennobl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 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 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 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 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s, 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r their exoticizati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 the 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 The twelve tendencies inter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pecific models and the illumination of these model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This paper makes an overall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interconnecting model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unilateral cause-and-effect model, bilateral cause-and-effect model, and multilateral cause-and-effect model.

Key words: textual deforming tendencies; models of interconnecting; unilateral cause-and-effect model; bilateral cause-and-effect model; multilateral cause-and-effect model

1 文本变形倾向

文本变形倾向由法国著名的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翻译家贝尔曼(A. Berman)提出,指“出现在每一篇译文中,并阻止译文成为‘对异的考验’的一系列导致翻译偏离原文目标的倾向或力量”(Berman 2000:286)。变形倾向是成系统的整体,由 12 个模块组成,包括:(1)合理化,指“重组原文的句子及其次序,按照某种话语顺序的观念,重新安排它们”(同上:288);(2)明晰化,指“把原文不希望变清晰的部分变得清晰,将多义变成单义”(同上:289);(3)扩充,指“并没有扩充任何实质性内容,却徒增文本的臃肿”(同上:290);(4)雅化和俗化,前者指“以原文为基础——并以牺牲原文为代价——而进行的改写”(同上:290 -

291) 后者指译者在处理带有乡野语言或城市方言之类的文本时“盲目依赖伪俚语,使原文俗化,或者凭借所谓的‘口语’,而事实表现出来的却是俚语与口语的混合物”(同上:291);(5)质量受损,指译者采用目标语中的“术语、表达法、人物形象来代替原文,但这些术语、表达法、人物形象缺少原文语言醒人耳目的丰富性,相应地,它们的指示或形象的丰富性也会受损”(同上);(6)数量缺失,指“译文包含比原文更少的所指”(同上:292);(7)节奏破坏,指翻译破坏原文的行文节奏;(8)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指破坏原文“隐藏于供读者阅读的文本表面之下的、由相互链接的能指构建的各式各样错综的网络”(同上);(9)原文语言模式的破坏,指译者破坏原文的风格,使

“译文比原文更均质化,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风格’”(同上:293);(10)原文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11)原文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12)原文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①,指抹煞原文“共存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共同语”(同上:295)的特征。

虽然贝尔曼的论证指出这12种倾向“有的联合出现或互为因果”(同上:288),但他没有论证这些变形倾向中哪些会联合出现,哪些互为因果,也没有论证它们之间以何种模式相互关联,在其之后的西方学者也没有对此做过研究。国内学者,如文军和曹思绮(2013)、严绚叶(2012)等,虽然拓展过文本变形倾向理论,但他们论证的只是变形倾向的普遍性,没有探究各倾向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鉴于明晰变形倾向之间的关联模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文本变形倾向理论,更能从理论上指导译者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文的异质,对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重要意义。“翻译活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涉及语言、社会、心理和政治等因素。”(谢柯 张晓 2017:97)笔者不揣谫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探究12种变形倾向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研究显示,贝尔曼构建的12种变形倾向主要以单向因果、双向因果以及多向因果3种模式相互关联。

2 单向因果

单向因果指在两种变形倾向之间,前者的出现会引发后者,但后者的出现不一定会引发前者。该模式主要有5类,现图式说明如下。

(1) 明晰化←—合理化—→扩充

合理化既有可能引发扩充,也有可能引发明晰化,而不是扩充或明晰化导致合理化。合理化之所以会引发明晰化是因为它过分强调“词语以及意思的明晰度”(同上:289),将原文刻意为之的朦胧性多重所指变成单一所指。例如^②:

① 香烟乱飘, /See incense waft in flight;

笙歌喧闹, /Hear music on flute played!

飞上玉楼腰。 /They fly up around the tower of jade. (Xu 2009:21)

“笙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指由笙这种乐器演奏出的音乐,意义上具有单一性,但后来文学上将其它乐器演奏的音乐也称为“笙歌”。也就是说“笙歌”在原文中既可能由笙奏出,也有可能由其它乐器奏出,“笙歌”在这里具有意象多重性和模糊性等特征。译文将“笙歌”定义为 music on flute played(笛子演奏的音乐),这当然不能说错误,但该译文毫无疑问将原文的多义变成单

义(合理化的一种手段)结果造成明晰化。

合理化之所以会导致扩充是因为它除了强调词语以及意思的明晰度之外,还会改变原文的措词,如“把动词变为名词,选择概括性极强的名词代替动词等”(同上:289),也常常改变原文的标点符号,这不可避免地也会添加一些不必添加的元素,造成扩充。例如^③:

② 月出皎兮, /The bright moon gleams;

佼人僚兮, /My love's snow-white.

舒窈纠兮。 /She looks so cute.

劳心悄兮。 /Can I be mute? (Xu 2006:92)

原文的两个逗号和第四句中的句号在译文中分别被换成分号、句号以及问号(合理化的一种策略)。原文的第三句和第四句只有主体,没有明确的形式主语,但在译文中这两句分别被添加明确的主语 she 和 I。在这里译者按照英语的话语顺序重组原文的句子,对原文进行合理化,但这些主语的添加和标点的更换明显地使译文比原文臃肿,引发扩充。

(2)

质量受损 ← 明晰化 → 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
数量缺失

明晰化可能会导致原文质量受损以及造成原文能指数量缺失,还有可能破坏原文的固定表达和成语。明晰化会引发质量受损,因为译者在翻译中实现明晰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采用目标语中的术语、表达法、人物形象代替原文的相关表达,但这些术语、表达法以及人物形象很难具备与原文一样的丰富性,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原文指示或形象的丰富性受损,即质量受损。不仅如此,由于明晰化习惯将原文中同一个能指的多个意象在译文中用多个能指替代,这必然使译文在能指数量上超过原文。这可以解释明晰化为什么也会引发数量缺失。我们可以通过比读“学界公认的《诗经》中最美的八行诗”(汪榕培 2007:34)的前4句以及理雅各的译文来演绎明晰化和上述3种倾向之间的因果关联。

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④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egge 1991: 409)

“依依”在原文中既可以指柳树春意盎然,绿意葱葱,也可以指柳枝似相爱的恋人一样你依我依,更有可能寓意两个相爱的人在柳荫下卿卿我我。总之“依依”在原文中具有多个意象,折射出

一种朦胧之美。译文 fresh and green 最多再出现“绿意葱葱”这一个意象。很明显,译者对原文进行(明晰化)处理。这种处理使译文不仅在质量上无法再现原文的多重意境以及朦胧美,在能指数量上较原文也缺失许多。此外,成语“杨柳依依”是“主题—话题”结构,而译文却将其处理为“主语—述谓”结构,这显然是对原文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在所有类型文本的翻译中,明晰化的出现都会引发质量受损以及数量缺失,但明晰化是否会破坏原文的固定表达和成语取决于原文是否使用固定表达和成语。如果原文没有使用固定表达或成语,那么这种因果关联就不会出现。例如:

④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⑤/Between the green willows the river flows along; My gallant in a boat is heard to sing a song.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Xu 2007b:194)

不难看出,译文对“晴”进行过明晰化处理。“晴”在原文中一语双关,既可指天气晴朗,也可以指恋人的爱情。译文 love 和 fine 虽然也折射出“晴朗”和“爱情”两个意象,但显然消除“晴”在原文中的双关功能,在意指质量上与原文相去甚远,在单个能指指涉的所指数量上也不及原文。但由于“晴”不是固定表达,更不是成语,所以译者对“晴”的明晰化处理没有对原文的固定表达以及成语构成破坏。

(3) 雅化与俗化——语言模式的破坏

雅化是译者在翻译高雅的文体时极易犯的一种文本变形倾向。犯雅化倾向的译者表面上是要在译文中竭力再现原文高雅的文体,但实际上只是通过“造出‘优雅’的句子”(Berman 2000:291)的方式推广他所推崇的某种修辞成分;俗化是译者在处理带有乡野语言或城市方言之类的文本时极易犯的变形倾向。贝尔曼指出,犯俗化倾向的译者在处理上述文本时往往“盲目依赖伪俚语,或者凭借所谓的‘口语’,而事实表现出来的却是俚语与口语的混合物”(同上)。也就是说,无论译者对原文进行雅化还是俗化处理,都会在语体层面“引入一些原文本质系统排斥的元素”(同上),会在语体层面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以严复对斯宾塞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中一段文字的翻译为例:

⑤ The visible surface of the sun is a luminous envelope, within which there are cloudy envelope covering a dark central body. (Spencer 1896:7) /太

阳为轮,为自发光气,犹地之风轮,再下则为云层,以裹日体不发光不透明之凝质,与大地同。(严复 1981:6)

原文是现代通俗英语,译文是汉语文言文。译者严复在这里为迎合当时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的桐城派的古雅文体将原文通俗流畅的“现代英文变成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像读《墨子》《荀子》一样”(冯友兰 1996:279)。他的雅化倾向确实有助于实现翻译目的,但也完全破坏原文通俗流畅的语言模式。

(4) 对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语言模式的破坏

当原文中存在方言网络或异国情调时,这种网络和异国情调就会参与原文语言模式的构建。译者在翻译此类作品时只有保留这两个模块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语言模式。贝尔曼指出,译者对传统的保留方法是将原文方言异国情调化(Berman 2000:294)。译者异国情调化的策略不外乎有3种,一是在译文中采用斜体呈现其所需展现的方言网络或异国情调,通过在排版上造成相关部分与译文其它部分的不同营造异国氛围;二是按照目标语方言的规约在译文中编造原文中不一定真实存在的方言;三是直接用目标语中的方言代替原文中的方言。然而无论译者采用何种策略,都只能“将外国的异变成本国的异”(同上)。也就是说,译者破坏原文的方言网络和异国情调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例如:

⑥ 那婆子吃他这两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鸟猢猻,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郢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马泊六!”(施耐庵 1985:384) / The old woman heard him say these words and she knew the real trouble was known and her heart filled with a mighty wrath and she yelled, “You cursed monkey! You come here into my house and pass your wind and scatter your filth!” Yun Ko said, “Well, and I am a little monkey, and you are an old woman who brings men and women together”. (Buck 2010:231)

原文中王婆与郢哥的詈言透着《水浒传》成文时期山东、河北一带的方言气息。“猢猻”将人骂作畜生,“含鸟”更是绝对不能为当时社会所接纳的断袖之癖。“马泊六”是北宋时期民众对拉皮条女性的侮辱性称呼。可见,原文中两个盛怒之下的人都竭己所能用最粗俗、侮辱意味最浓的詈言攻击对方。译者用 You cursed monkey 指代“含鸟猢猻”,然而 monkey 在英文中并不具备原文

中“猢猻”所体现的贬低他人的功能,即便在前面添加表达愤怒情绪的 *You cursed*,其也不具备“含鸟猢猻”意指的断袖之癖。另外 *an old woman who brings men and women together* 也没能很好体现“马泊六”的拉皮条之意,因为该短语在英语中既可以表示将男女撮合在一起干坏事,也可以表示给男女牵线搭桥做好事,而原文只表示做坏事。不难看出译者在翻译这两个誓言时直接用目标语中的方言语汇替代原文中的方言,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原文的誓言情调。由于誓言恰恰是体现这段文字语言模式的核心元素,破坏它自然就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

(5) 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语言模式的破坏

当原文中既含有原语中的共同语又含有该语种中的一种或多种方言时,它便具备多种语言重叠的特征。很明显多种语言的重叠也是构建原文语言模式的重要元素,对它的消除自然会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例如:

⑦ 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施耐庵 1985:142) / “As an arms instructor of the Imperial Guards, you must know the law?” the Marshal raged. “Why also would you enter the Inner Sanctum with a sharp sword in your hand if not to murder me?” (Shapiro 1999:203)

原文取自金圣叹本《水浒传》第六回,高俅设计将林冲诱入白虎堂后对他作这般训斥。高俅的训斥以“因何”为界分成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语体截然不同。“因何”之前的是古白话文,“因何”之后的是文言文。很明显原文呈现出多种语言重叠的语言模式。但译文却把原文中的白话文和文言文全都翻译成通俗英语,这无疑抹煞原文中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重叠关系,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

3 双向因果

12种变形倾向之间除了存在单向型的因果关联之外,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倾向之间彼此互为因果,前者的出现会引发后者的出现,后者的出现也会引发前者的出现。笔者的研究显示,这种双向型因果关联主要存在于两对变形倾向之间,一对是节奏破坏与固定表达和成语的破坏,另一对是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与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

(1) 节奏破坏↔固定表达和成语的破坏

这种双向因果关联频繁出现在诗歌翻译中,主要是因为诗歌的节奏由格律、韵律、标点等元素构建,而且常常含有固定表达和成语。由于诗歌篇幅短小,翻译时留给译者斡旋的空间有限,破坏诗歌的节奏自然很难完美再现用于其中的固定表达和成语,同样破坏诗歌的固定表达和成语必然也容易破坏诗歌的节奏。散文、小说、戏剧等其它文学体裁虽然也常常使用固定表达和成语,但由于这些体裁类文本,尤其是小说文本的节奏,不是由格律、韵律或标点符号等元素构建,而是由“一系列互相呼应的事件构建”(卡尔维诺 2009:37)“成篇地推进,所以翻译想破坏它的节奏也难”(Berman 2000:292),即便译者没有保留原文的固定表达或成语,也不一定会破坏原文的节奏。试以刘辰翁《鹤桥仙·天香吹下》^⑥后阙的翻译为例:

⑧ 长空皓月, / But in the endless sky the moon is bright;

小风斜露。 / The dew is slight and the breeze light.

寂寞江头独步。 / By riverside I stroll in lonely gown.

人间何处得飘然, / Where can I be carefree?

归梦入、梨花带雨。 / A dream of pear blossoms in tears haunts me. (Xu 2007a:428)

原文基本由固定表达和成语组成,节奏主要由以下几个元素构建。首先是13个音顿(除“归梦入”“得飘然”为3字顿外,原文中每两个汉字为1个音顿);其次是6个诗行以及与之伴随的6个标点;再次为韵脚/u/。在译文中,译者将原文最后两行合并成一行,很显然它破坏“梨花带雨”这个成语的独立性。不仅如此,译者的这一合并还破坏原文的诗行数目和标点数目,在标点层面破坏原文的节奏。可见在诗歌翻译中,对固定表达和成语的破坏会造成对原文节奏的破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译者破坏原文最后两句的节奏,才使原文中“梨花带雨”这个“主语+动宾”结构的成语在译文中只能被转化成“中心词+后置修饰语”结构。也就是说,这两种变形倾向在这里不分先后,相互诱导。

(2) 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

这种双向型因果关联存在于由方言和共同语一起构建的文本中。不仅原文中共存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共同语能形成多种语言重叠的文体风格,原文中共存的共同语和方言也能构建这种文体风格。如果译者在译文中没有保留原文中的方

言以及与之伴随的异国情调,而是将其转换成单一语言,那消失的不仅仅是原文中的方言网络和异国情调,同时还有原文中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并置重叠关系。同样,在此类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如欲消除原文中多种语言的重叠,那他势必也会破坏原文的方言网络和异国情调。请看金圣叹本《水浒传》中的这段文字以及该作品的另一位译者杰克逊的译文:

⑨ 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施耐庵 1985:93)/Lu Ta took twenty ounces of silver, and gave them to Lin Ch'ung. He also gave three ounces of silver to the two constables, and said, "If I had been by myself I would have decapitated both of you before now, but as my younger brother has pleaded for you I will let you off this time. Now your destination is not far away so you must not harbor your original vile plan". (Jackson 1979:95)

在该段文字中,“撮鸟”“鸟命”是方言,其余部分为古白话文。可以看出,在该段文字中,既存在方言网络和异国情调,也存在多种语言的并置。比读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原文中的古白话文被译成通俗的现代英语,“撮鸟”“鸟命”被统一译成现代英语代词 you。毋宁说保留原文的方言和异国情调,就连原文骂人的意蕴也消失殆尽。很显然,杰克逊对原文方言网络以及异国情调的消除直接导致原文中多种语言重叠的消失,也正是因为杰克逊不想保留原文多种语言重叠的文体特征,于是消除原文的方言网络。两种倾向在这里也是互为因果,二者不分先后。

4 多向因果

当多个变形倾向彼此关联合力引发某个变形倾向时,它们之间的关联模式就是多向因果模式。在贝尔曼勾勒的12种变形倾向中,原文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以及原文整体语言模式的破坏都不是由哪一个倾向单独引发的,而是由多个倾向联合引起。

4.1 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

贝尔曼认为,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供读者阅读的由多种文字符号组成的表面文本,另一部分潜藏于表面文本之下由特定的相互对应链接的能指构建的潜在指示网络(Berman 2000:292)。指示网络可能由词汇构建,也可能由语句构建,而

更多时候则由特定的词汇和语句共同构建。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前后两次上五台山时对其师父智真长老讯问的回答就潜藏着一个指示网络,该网络由称呼、粗俗语、白话以及文言文组成。

⑩ “智深吃了两碗酒,又不曾撩拨他们,他众人又引人来打洒家”。(施耐庵 1985:49) / “I had a couple of bowls of wine, but I did nothing to provoke these fellows,” said Sagacious. “They came with a gang and attack me.” (Shapiro 2009:133)

⑪ “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弟子无用,特地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公用。”^⑦ / “These are the rewards I've accumulated. They are of no use to me. I've brought them especially for you, teacher, to us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同上:2715)

例⑩是金本《水浒传》第三回中鲁智深犯命案,初到五台山醉酒闹事后对智真长老讯问的回答。这段文字中鲁智深用平称“智深”和方言“洒家”称呼自己,用粗俗的白话文描述事情的起因,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蛮横。例⑪是沙博理版本《水浒传》第九十回中鲁智深历经数年梁山历练以统军将军的身份再次拜访五台山对智真长老询问的回答,这时他用谦称“弟子”称呼自己,用四字结构为主体的文言描述事件起因,字里行间透着浓郁的“礼”字。作者在这两段言语中借由称谓变化和语体变化构建出一个潜在的网络,该网络影射出鲁智深的人生修为已由江湖草莽上升至智真长老先前预测的正果境界。然而在两段文字的译文中,译者不作区分,将“智深”“洒家”“弟子”都翻译成 I。

显而易见,I无论是在指称质量上还是在指称折射的使用语境的数量上都远不及原文。译者在这里明显造成质量受损和数量缺失的变形倾向。不仅如此,译者还将鲁智深的粗俗语、方言、一般通俗语和文言礼貌语不作区分全部翻译成通俗英语,明显破坏原文的方言网络和异国情调,消除原文多种语言重叠的特征。由于译者的上述变形倾向使译文缺少折射鲁智深人生修为上升的相关能指,破坏原文潜在的指示网络。

4.2 整体语言模式的破坏

上文论证雅化和俗化、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以及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都可以导致原文语言模式的破坏,但这样的破坏只是部分破坏,不是整体破坏,因为文本的整体语言模式,即文本的整体风格由构建相关文本的语汇风格、句式风格、标点风格以及语篇风格等融合而成。虽然译者在任一层面的变形倾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

原文语言模式,但原文整体语言模式的破坏通常是多种变形倾向联合发力的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比读《天净沙·秋思》^⑧和其译文来简要图示多种变形倾向如何合力破坏原文的整体语言模式。

⑫ 枯藤老树昏鸦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crows;

小桥流水人家 /Under a small bridge beside a cot a stream flows;

古道西风瘦马。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夕阳西下 /Westwards declines the setting 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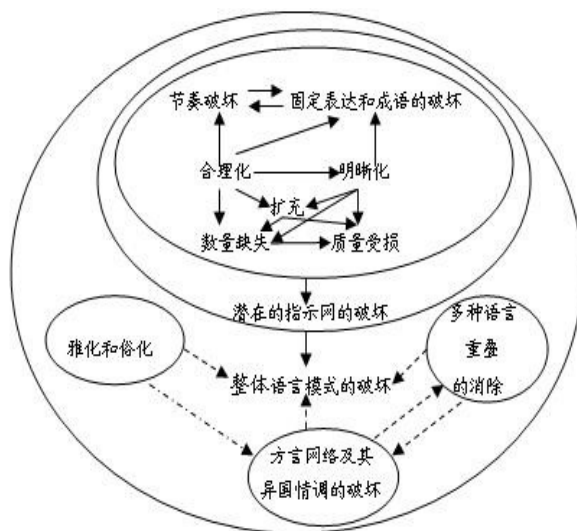
断肠人在天涯。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Xu 2009: 66)

在《天净沙·秋思》中,“枯藤”可能是多根,也可能只是一根;“老树”也许是一棵,也可能是多棵;“昏鸦”可能有多只,也可能只有一只;昏鸦可能在绕树飞翔,但也有可能栖立在树枝上。译者在译文中将“枯藤”定位为多根,“老树”定位为多棵,“昏鸦”定位为多只,且在飞翔。我们不能说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有误,毕竟他的理解也是原文图式画面的一部分。然而译者在这里很明显对原文物象进行过(明晰化)处理,将原文的多义变成单义。译者使用单一物象替换原文的多重物象,不仅造成原文物象的数量缺失,更损害原文物象的丰富性(质量受损)。这一切的变形倾向实际在词汇层面破坏原文的整体语言模式。

译者不仅通过(明晰化)等变形倾向在词汇层面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还通过合理化及其引发的变形倾向在句法层面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译者合理化常用的手段是更改原文的标点和句式,这两种手段在《天净沙·秋思》的译文中一览无遗。首先原文的5处标点在译文中变成6处。其次,在句式上,原文前两句都是由3个层级一样的短语构建的并列结构,短语与短语之间没有动词链接,但译文却是主语+谓语+修饰语结构,原文层级一样的短语在译文中被安置在不同的语法层级,短语之间也被植入动词。另外“主语+述语”结构的成语“夕阳西下”在译文中被更换成倒装结构。译者按照英语话语习俗对原文句式合理化,破坏原文的格律和韵律(节奏破坏),破坏原文简练的构架(扩充),也破坏成语“夕阳西下”的结构(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而这一切相互关联的变形倾向都在句法层面破坏原文的整体语言模式。

“枯藤”“老树”“昏鸦”折射的是一种静态甚

至是死寂,因为即便“昏鸦”在绕枝飞翔,也无法改变潜藏于这3个物象之下的噩运将要来临或生命即将终结(潜在指示网络),因为乌鸦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是死神来临的征兆。然而,“流水”却又折射出一股动态甚至灵动,“人家”更是折射出绵绵的生机与希望,二者共同织就一个蕴示美好的指示网络。可正当一股虽绵却又不绝的希望升起时,“西风”又令人胆寒,“瘦马”又让人没有信心,西下的夕阳更是令人感到渺茫。总之,作者在这里借由多个指涉构建出一副动与静、寒与暖相互交织,生与死、希望与绝望彼此攻守的潜在指示网络。然而译者对原文句式的合理化,特别是对原文物象的明晰化以及该倾向引发的其它变形倾向令人感觉到一副黑暗即将吞噬一切的画面,这实际上在篇章层面破坏原文的整体语言模式。我们尝试将这一关联模式整理如下图。



上图的实线箭头部分演绎出在《天净沙·秋思》的翻译中多种变形倾向如何合力破坏原文的整体语言模式。由于原文中不存在方言网络和多种语言,在翻译中也没发生雅化和俗化倾向,因此这些变形倾向在这里没有参与破坏原文的整体语言模式。如果原文由方言、标准语甚至多种语言构建,那么上图中的虚线箭头演绎的单向型、双向型以及多向型变形倾向就会发生。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贝尔曼的12种变形倾向以单向因果、双向因果以及多向因果3种模式相互关联。在单向因果模式中,合理化会造成明晰化,也可能引发扩充。明晰化会致使质量受损,也会导致数

量缺失以及破坏原文的固定表达及成语。此外,雅化与俗化、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各自都可以部分破坏原文的语言模式。如果原文多种语言重叠的特征不是由原语中的多种共同语构建,而是由某种共同语和方言构建,并且译文用同一种语言呈现原文的共同语和方言时,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同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之间会形成双向因果关联。另外,在翻译包含固定表达和成语的诗歌时,节奏破坏与固定表达和成语的破坏之间也会形成双向因果关联。在多向因果模式中,原文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以及原文整体语言模式的破坏都由多种变形倾向合力引发。

注释

- ①这些倾向的英文术语是:rationalization, clarification, expansion, ennobl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 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 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 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 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s, 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r their exoticizati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 the 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
- ②该部分原文和译文都出自中国翻译出版公司 2009 年出版的 *300 Yuang Songs* 第 21 页。
- ③该部分原文和译文都引自许渊冲编译的、北京国际出版公司 2006 年出版的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第 92 页。
- ④本文中的诗歌都引自李泰安编辑的、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诗经》。
- ⑤该部分原文和译文都引自许渊冲编译的、中国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年出版的 *300 Tang Poems* 第 194 页。
- ⑥该部分原文和译文都引自许渊冲编译的、中国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年出版的 *300 Song Lyrics* 第 428 页。
- ⑦原文引自沙博理翻译的、外文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 *Outlaws of the Marsh* 第 2714 页。
- ⑧该部分原文和译文都出自中国翻译出版公司 2009 年出版的 *300 Yuang Songs* 第 66 页。

参考文献

-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卡尔维诺.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李泰安. 诗经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0.
- 施耐庵. 水浒传(金圣叹本)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 汪榕培. 《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 [J]. 中国翻译, 2007(6).
- 文军 曹思绮. 贝尔曼理论下《兵车行》两译本对比分析 [J]. 英语研究, 2013(3).
- 谢柯 张晓. 情绪智力与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J]. 外语学刊, 2017(5).
- 严复. 群学肄言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严绚叶. 论贝尔曼的“变形倾向”——以陈德文所译《破戒》为中心 [J]. 日语知识, 2012(10).
- Berman, A.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 of the Foreign [A].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Buck, P. S. *All Men Are Brothers* [M]. New York: Mayor Bell Company, 2010.
- Jackson, J. H. *Water Margin* [M].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 Legge, J. *Shijing* [M]. London: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 Shapiro, S. *Outlaws of the Mar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9.
- Spencer, H. *The Study of Soci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896.
- Xu, Y. -C.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M].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6.
- Xu, Y. -C. *300 Song Lyrics* [M].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a.
- Xu, Y. -C. *300 Tang Poems* [M].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b.
- Xu, Y. -C. *300 Yuang Songs* [M].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定稿日期: 2018 - 02 - 10

【责任编辑 王松鹤】